

中国—东盟文化廊道视域下广西传统园林谱系考辨与跨境保护协同机制探究

Research on the Genealogy of Traditional Gardens in Guangxi and the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for Cross-border Protection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China-ASEAN Cultural Corridor

李军 桂杰

LI Jun, GUI Jie

基金项目: 2024年广西哲学社会科学年度课题“广西左右江流域壮族传统聚落景观演变机制与当代多维重构研究”(编号: 24SHIF022);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校级重点项目“西南民族地区传统园林演进机制、营造智慧与遗存保护研究”(编号: 2025ZD029);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高层次人才项目“左江花山岩画遗产地‘家园聚落’价值阐释及其保护利用协同路径研究”(编号: 2023SBNGCC017)

摘要

中国—东盟文化廊道是“一带一路”倡议下文明互鉴的关键载体。研究综合运用谱系学方法追溯广西传统园林的历史演变与跨境脉络, 结合多维理论框架进行系统分析, 并通过典型案例的深度阐释, 揭示其文化内涵、风险成因及保护机制的可能路径, 以期为中国—东盟文化廊道背景下的文明互鉴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研究揭示广西传统园林“汉式礼制”与“壮侗自然”二元共生、功能主导的核心特征与“碎片化”困境; 并从技术流变、符号重组、生态协同三维解析园林文化跨境互动机制, 剖析在现代化进程中衍生的“防御—贸易”基因剥蚀与过度商业化篡改风险。最后, 设计包含“遗产共同体”治理框架、统一标准数字博物馆及“社区守园人”工具的系统性协同机制, 并通过中国、越南和老挝3个案例阐释其应用路径。

Abstract

The China-ASEAN Cultural Corridor is a key carrier of civilizational mutual learning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is study employs a comprehensive genealogical approach to trace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cross-border connections of Guangxi's traditional gardens,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m through a multidimensional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reveals their cultural connotations, risk causes, and potential protective mechanisms through in-depth case studies. The research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cultural exchange within the China-ASEAN Cultural Corridor. The research uncovers the dual symbiosis of 'Han-style ritual systems' and 'Zhuang-Dong natural aesthetics' as the core characteristics of Guangxi's traditional gardens, along with their 'fragmentation' dilemma. By examining cross-border interaction mechanisms from three dimensions—technical evolution, symbolic restructuring, and ecological synergy—it dissects the 'defensive-trade' genetic erosion and excessive commercialization risks arising during modernization. Finally, it designs a systematic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encompassing a 'heritage community' governance framework, a unified standard digital museum, and 'community garden guardians' tools, elucidating their application pathways through three case studies in China, Vietnam, and Laos.

文章亮点

1) 研究在跨境动态语境中系统建构广西传统园林“功能主导、二元共生”的独特谱系, 揭示了其“防御—贸易”基因剥蚀与过度商业化篡改等核心风险。2) 构建“技术—符号—生态”三维互动模型与“治理—技术—工具”三级协同机制, 为跨境遗产保护提供了整合性理论框架与系统性解决方案。3) 提出“遗产共同体”实体化治理架构与“社区守园人”赋能工具, 推动文化廊道从理念走向责任与利益共享的协同治理实践。

关键词

中国—东盟; 广西传统园林; 文化遗产; 文化基因; 跨境遗产保护; 遗产共同体; 协同治理

Keywords

China-ASEAN; Traditional gardens of Guangxi;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al genes; Cross-border heritage protection; Heritage community;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收稿日期: 2025-10-29

修回日期: 2025-12-04

“中国—东盟文化廊道”是“一带一路”倡议下推动文明深层对话与共同发展的重要空间脉络。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其焦点已从早期的经济互联互通,逐步拓展至文化遗产、生态共生等跨学科领域,学界已取得一系列基础性成果。在宏观层面,学者们探讨了文化廊道作为文明互鉴载体的理论建构与历史演进^[1];在区域层面,对西南地区建筑文脉^[2]及跨境旅游治理与模式的研究^[3-5],揭示了文化流动的复杂肌理;在对象层面,广西壮族自治区传统园林的文化特征与传承应用也已引起关注^[6]。此外,中越德天(板约)瀑布跨境旅游合作区建设^[7],以及文化遗产领域开放合作机制的探讨^[8],均为跨境遗产协同治理提供了有益参照。

然而,现有研究在系统性上仍存在明显不足:一是对广西传统园林的探讨多集中于个案描述或风格分析,缺乏在中国—东盟文化廊道这一动态跨境语境下,对其生成逻辑、结构特征与演进脉络的整体性谱系建构与深度阐释。二是研究视野多局限于单一国界之内,未能充分审视现代化、全球化及跨境互动对园林遗产存续造成的系统性风险,特别是对其核心文化基因的剥蚀与篡改威胁关注不足。三是针对此类跨境活态遗产的保护机制探讨往往停留于原则性倡议或孤立项目层面,缺乏一套融制度性治理框架、统一性技术标准与在地化实施工具于一体的系统性协同方案设计及可行性论证。

广西作为廊道陆海交汇的关键门户,其传统园林是中原礼制文明、少数民族生态智慧与东南亚文化元素长期交融、层累积淀的产物,构成独特且动态的跨文化谱系。填补上述研究空白,对于深化区域文化认同、保障跨境遗产的可持续存续与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聚焦于以下3个递进的核心问题:1)如何在中国—东盟跨境互动与多民族交融的背景下,系统建构并阐释广西传统园林的独特谱系,其核心特征与历史脉络为何?2)该谱系在当代城市化与全球化的冲击下,正面临哪些关键的系统性存续风险,其生成机制如何?3)如何构建一套具有针对性、多主体参与的跨境协同保护机制,以有效应对上述风险?研究将综合运用谱系学方法、多维理论框架分析与案例阐释予以回应,旨在为中国—东盟文化廊道文化遗产的精细化保护、理论创新与实践推进提供学理支撑与路径参考。

1 广西传统园林谱系的建构与特征

1.1 谱系建构的方法论框架

为超越简单的现象罗列,本文将广西传统园林谱系定义为在广西独特地缘政治、多民族历史层累及持续性跨境互动背景下演化生成的、具有共同地域文化基因与稳定结构特征的园林集群。其建构遵循一套复合方法体系,以确保研究的系统性与科学性。

在研究原则上,首先强调整体性,即将任何园林个案置于其所在的自然生态基底、民族社会网络及更宏观的中国—东盟文化廊道视野中考察,关注水网、山形、古道与园林选址、布局的内在关联。其次注重层叠性,承认广西文化地貌是汉文化、各世居民族文化及东南亚文化影响长期叠加的结

果,通过辨析不同历史“地层”在具体园林空间上的叠压与融合,理解其复杂成因。最后坚持动态性,将谱系视为活态的生命过程,既追溯其从秦汉戍堡绿带到明清成熟类型的生成演变,也直面其在近代的断裂与嬗变。

在研究依据与具体方法上,本文依托4类材料与3种核心分析技术。文献考据(方志、碑刻、外交文书)与田野调查(测绘、影像、匠人口述史)构成了历史信息与现状数据的基底。GIS空间分析技术将分散的遗产点与历史交通线、民族分布区、地形高程等数据进行空间叠合与可视化处理,从而客观揭示园林分布与地理格局、文化分区的内在关联。类型学比较法则在大量案例基础上,依据核心功能、空间组织方式的相似性进行科学分类,提炼出边防关隘园林、土司衙署园林等理想类型。此外,引入文化基因识别法^[9],旨在从纷繁表象中提取那些如“遗传密码”般稳定传承、决定园林地域身份的核心要素,如干栏构架技术、多神祭祀的空间惯习等,从而把握谱系的内在凝聚力。

1.2 谱系的核心特征与多维呈现

基于上述方法论框架,广西传统园林谱系呈现出一种迥异于江南文人园林或北方皇家园林的独特面貌,其最核心的特征可概括为“二元结构性”与“功能性主导”。“二元结构”指汉式礼制秩序与本土(以壮侗民族为代表)自然适应性智慧在园林空间中既并存又融合的普遍状态;“功能性主导”则指园林的形态布局、空间组织首要服务于具体的政治、军事、经济或社会生活功能,美学追求常居其次。谱系的根本特性通过以下4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具体呈现(图1)。

1.2.1 空间分布谱系:地理格局下的文化分异

广西复杂的地形与多元的文化板块,塑造了园林谱系清晰的地域分异格局。西江流域型(以梧州、桂林为中心)地处连通岭南与中原的交通动脉,受广府、荆楚文化浸润深远,园林布局中轴线明确、礼制秩序感强,亭台楼阁等建筑元素较为突出,“汉化”程度最深。桂西南边境型(以凭祥、龙州为代表)是谱系的精髓所在,地处边防前线与贸易通道,园林深度嵌入“关隘—通道—市集”的线性军事商贸体系中,空间序列感强,功能高度复合,是“防御—贸易”二元基因最典型的物质载体。桂北土司型(以南丹、忻城等地为代表)在相对封闭的山地环境中,形成了汉式衙署礼制空间与当地干栏式聚落群落有机嫁接的模式,园林兼具权力象征、生活起居与生态防护功能。北部湾沿海型则因海防与海洋贸易,园林中常融入炮台、望楼等海防设施,景观上更显开阔,并吸纳了部分南洋建筑装饰元素,体现出文化的开放性与异质性。

1.2.2 历史演进谱系:长时段下的层累生成

从长时段历史视角看,该谱系经历了3个关键阶段。一是萌芽与融合期(秦汉至宋元)。随着中央王朝的军事征服与郡县制推行,中原的城池营造技术与礼制空间观念传入。中原造园传统最初表现为军事戍堡内的简单绿化和土官衙署的附属园地,开始初步适应本地环境。二是成形与鼎盛期(明清)。在明清两代加强对西南边疆经营与控制的背景下,边

防体系建设、土司制度完善以及商业活动活跃，共同催生了边防关隘园林、土司衙署园林、商贸会馆园林三大类型的成熟与定型，谱系的结构性特征在此时期完全显现。三是嬗变与碎片化期（近代至今）。近代以来，战争、社会变革，尤其是快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导致大量传统园林被毁、功能丧失或语境隔离，谱系的内在链条出现断裂，遗存呈现“孤岛化”状态，整体性遭受严重破坏。

1.2.3 类型-功能谱系：实用理性导向的空间范式

以功能为首要驱动因素，广西传统园林可划分为4种理想类型，每种类型都有其主导的空间范式。一是边防关隘园林，其核心功能是军事防御、边境管控、外交接待与边境贸易；其空间范式典型表现为“关楼（防御象征）-通道（管控与通行）-市集（贸易与交往）”的线性序列，功能高度压缩复合。二是土司衙署园林，其核心功能在于彰显世袭统治权威、作为聚落公共活动中心以及举行祭祀仪式；其空间上常呈现“中轴对称的衙署礼仪区”与“自由布局的生活起居区（多采用干栏式）”的二元嵌套结构。三是商贸会馆园林，其核心功能是为同乡商人提供联谊、停歇、货物中转与议事的场所；其空间多表现为内向围合的天井或庭院，注重实用性与私密性，装饰上常融合多地风格。四是乡土聚落园林，其根植于村寨社区，核心功能是祭祀社稷、日常休闲与生态防护（如风水林）；其空间形态最为自由，常与寨门、鼓楼坪、井台、古树等自然与人文要素散点结合，融为一体。

1.2.4 文化基因谱系：维系地域身份的内在密码

超越物质形态，部分稳定传承的文化基因构成了谱系的

内在凝聚力。物质性基因包括：适应湿热气候的干栏式构架技术；对本土材料（如红土、青石、杉木、榕树）的创造性运用；以及城墙、炮台、碉楼等军事构筑物在园林中的转化利用。社会性基因则体现为：容纳多元信仰（祖先、土地、自然神祇）的祭祀空间在园林中的保留；为歌圩、节庆等民俗活动提供场地的公共性；以及普遍存在的以“廊”（风雨桥、骑楼街廊）等线性空间来界定领域、组织交通与促进交往的习惯。这些基因是识别广西传统园林身份，并理解其与中原及东南亚园林差异的关键。

1.3 谱系的现实困境：近代以来的碎片化

本文所建构的广西传统园林谱系，并非已然消逝的完美图景，其当前正遭受着严峻的“碎片化”危机。快速且同质化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如同一把利刃，切割着园林遗产与历史语境、地理脉络及社区生活的有机联系。这种“碎片化”在不同类型的城市和区域中有不同表现，但其本质都是谱系完整性与活态性的损伤。

在南宁这类因近代商贸而兴起的城市，传统园林（如骑楼街区、码头园林）的“碎片化”主要表现为空间功能的置换与历史语境的孤立。原服务于水陆联运商贸网络的街区与码头，被改造为高度商业化的步行街或孤立的市民公园，其赖以生存的交通运输与经济功能已然消失，成为脱离原有脉络的“消费飞地”。在柳州这类经历剧烈工业转型的城市，谱系遭受了近乎物理性的抹除与记忆覆盖。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导致传统园林的物质载体几近消亡，尽管后来“花园城市”建设在生态层面卓有成效，但其大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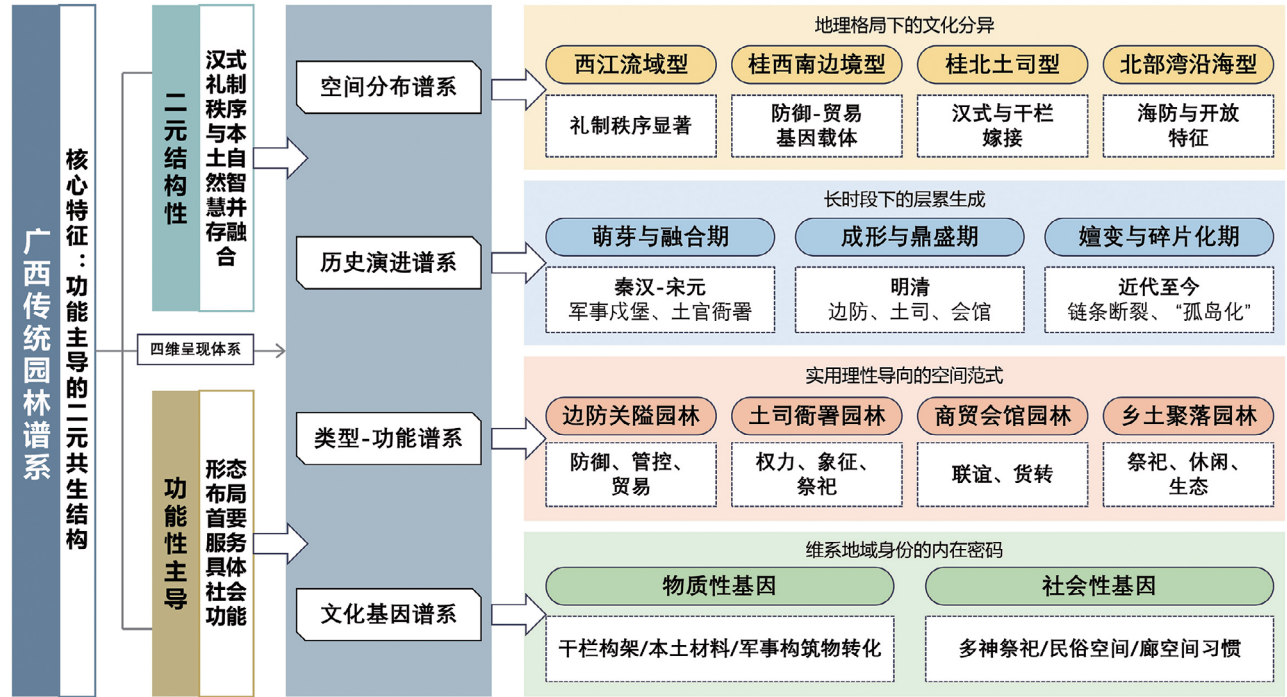


图1 广西传统园林谱系特征与多维呈现

Fig.1 Characteristics and multidimensional presentation of traditional gardens in Guangxi

模种植的现代观赏植物（如宫粉羊蹄甲 *Bauhinia variegata*），在某种程度上是以新的景观层覆盖了历史断层，本土园林的文化记忆面临被遮蔽的风险。在桂林这类历史文化名城，谱系困境更多在于管理权属变更与文化叙事的断裂。部分著名的文人园林（如雁山园）历经不同机构使用，其作为教育、学术交流场所的连续历史叙事被打断，建筑本体也面临衰败，亟待深度的价值阐释与活态传承。而在边境口岸地区（如友谊关），最核心的问题是“防御-贸易”二元基因链的断裂。原本功能复合的关隘园林，在旅游开发中被简化为单一的观光景点，其与对面越南同类遗产的空间与叙事联动缺失，导致整个边境文化廊道的叙事不完整，基因的辩证统一性被削弱。

2 谱系碎片化与跨境互动中的风险生成

2.1 跨境互动的三维实证

中国与东盟间的园林文化交流，远非简单的单向传播或风格模仿，而是在技术、符号与生态等多个层面持续进行的、充满能动性的在地化与再创造过程^[10]。为系统解析这一复杂过程，本文构建了涵盖技术流变、符号重组、生态协同的三维分析框架（图2）。该框架的理论依据在于：文化适应理论关注物质技艺在跨环境传播中的调适机制^[11-12]；符号学理论阐释文化符号在身份政治与意义生产中的重组逻辑^[13-15]；生态遗产观则强调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形成的、跨越国界的协同智慧^[16-17]。三维度分别对应物质实践、意义表征及自然基底，共同构成了理解跨境园林文化动态的完整视角。

2.1.1 技术流变：技艺传播中的文化适应与本土创新

粤派灰塑在越南顺化皇城的本土化变异是技术流变的典型案例。粤派灰塑原以其繁复精巧的汉地吉祥纹样与鲜艳色彩著称，随华南工匠传入顺

化后，为适应京族王朝的审美需求与当地炎热多雨的气候，发生了一系列创造性调适^[18]：在题材上，融入了莲 *Nelumbo nucifera*、槟榔 *Areca catechu* 等本地植物及越南神兽“Nghiê”的形象，实现了文化符号的混合；在材料工艺上，调整了石灰配方，掺入本地植物纤维以提升抗裂性与耐久性；在功能与审美上，造型更注重遮阳导雨的实用性，整体色调趋于沉稳以与皇城建筑群协调。这一流变过程生动诠释了文化适应理论，即跨境技术传播的本质是一种为寻求“环境拟合”而进行的主动再创造，其结果催生出既保留源技术基因、又深度契合在地条件的新形式。

2.1.2 符号重组：跨文化语境下的身份表达与意义拼贴

在多元文化交汇的移民社会，园林成为意义争夺与身份协商的视觉文本。马来西亚槟城客家园林中广府砖

雕与英式铁艺的并置与拼贴，是符号重组的典型。广府砖雕承载着华南移民的原乡记忆与文化传统，而轻巧精致的英式铁艺则象征着“殖民时代”的权力与现代技术美学。2种异质符号在同一个园林空间中并置，并非偶然混杂，而是一种有意识的拼贴策略。其映射出客家移民社群复杂的心态：通过保留砖雕维系与中华文化母体的联系，巩固内部认同；采纳铁艺符号既是对殖民权力秩序的策略性妥协，也表达了对现代性与进步的追求。这种重组体现了符号学的核心观点，即意义并非固定，而是在与“他者”的对话中被不断生产和重构^①。

2.1.3 生态协同：基于自然地理的智慧共享与跨境耦合

超越物质与符号层面，中国与东盟园林文化更深层的互动根植于共享的自然地理单元所孕育的生态智慧，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共有的稻作水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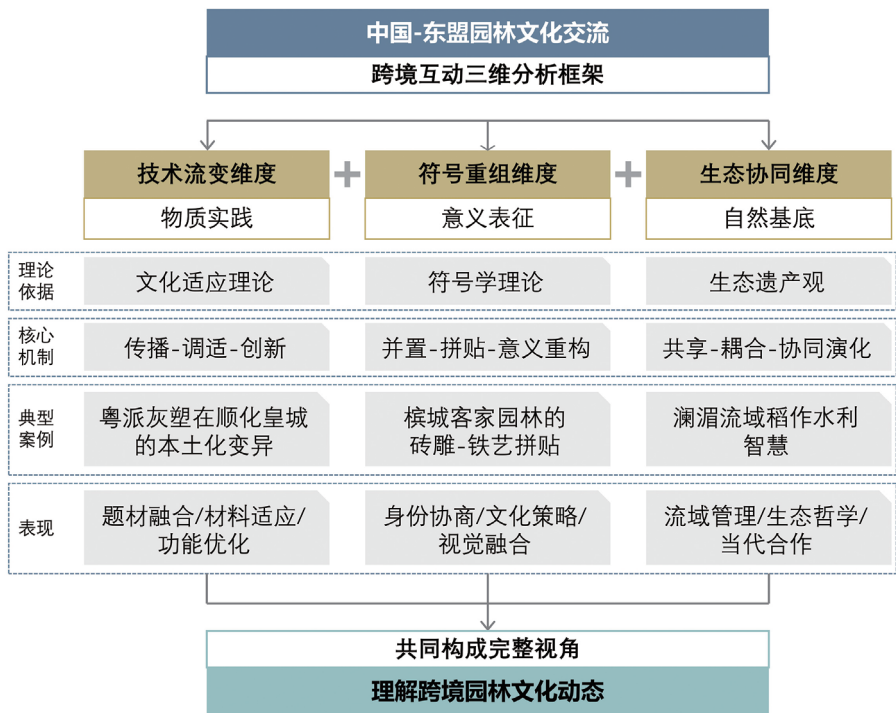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东盟园林文化跨境互动模式图

Fig.2 China-ASEAN Garden culture cross-border interaction model

① 巴赫金（Bakhtin）的对话理论揭示意义并非封闭的实体，而是在主体间即与“他者”的遭遇与对话中不断生成与重构的。这一观点后经克里斯蒂娃（Kristeva）发展为“互文性”理论，成为符号学分析文本与文化实践的重要基石。

文明即为明证。尽管尺度不同，但泰国北部山地的“溪流分层调控”模式（通过微型水坝、立体沟渠实现灌溉、动力与景观一体化）与广西的“灵渠大型引蓄平衡”模式（通过铧嘴、大小天平、陡门实现跨流域水量分配与航运），两者的内核都体现了对水循环规律的深刻理解、低干扰且高效利用的系统工程思想，以及追求“人-水-田”和谐共生的生态哲学。这种基于相似自然约束而产生的协同智慧，构成了区域生态文化遗产的深层共识，为当前澜湄合作框架下的跨境生物多样性保护、水资源协同管理等提供了深远的历史范式与理念基础。

2.2 从互动到风险

历史维度的良性互动，证明了廊道文化遗产内在的开放性与适应性。然而，在当代以资本为主导的全球化与旅游开发浪潮中，跨境文化互动的逻辑发生了扭曲。原本缓慢、有机的“适应”与“重组”过程，被快速、同质化的商业开发所取代；共享的“生态协同”智慧，则常让位于割裂的、追求短期利益的发展模式。这使得广西传统园林谱系的固有脆弱性（特别是其依赖于特定功能语境和社会网络的“活性”，以及“二元结构”所需的精妙平衡）被急剧放大，转化为以下2类突出的跨境遗产风险。

2.2.1 广西段核心风险：“防御-贸易”基因的剥蚀与空洞化

广西南西边境地区的园林遗产（以凭祥友谊关为典型）的谱系核心价值在于“防御”与“贸易”2种基因在物质空间与历史叙事中的辩证统一与功能复合。然而，当前以观光为导向的旅游开发，正导致这一核心基因发生系统性“剥蚀”与空洞化^①。首先，空间格局的碎片化切割了基因载体。新建旅游设施、停车场等侵占历史通道，导致“关隘-通道-市集”的线性序列遭到破坏，关键军事视线廊被遮挡，空间叙事链条断裂。其次，环境原真性的丧失稀释了基因的真实性。尽管文物本体可能得到修缮，但周边大量涌现的仿古商业街却使用现代材料与工艺，使得历史环境的整体氛围与可信度下降，遗产沦为“舞台布景”。最后，社区关联性的弱化抽离了基因的灵魂。本地居民与传统生计方式被边缘化，与遗产相关的民俗活动频次锐减，遗产地从功能复合的、有生命的“社会-空间复合体”，退化为功能单一的、仅供外部凝视与消费的“历史标本”。“防御”沦为猎奇的战争故事，“贸易”简化为千篇一律的旅游购物，基因的深层历史内涵与社会功能被掏空。

2.2.2 东盟段典型风险：过度商业化导致的系统性篡改与主体置换

在东盟国家快速发展的旅游目的地，文化遗产面临另一种严峻风险，即过度商业化引发的从物质到社会的系统性篡改。越南河内“三十六行街”历史街区的演变即明证。该街区原以“前店后坊上宅”的庭院住宅模式和鲜明的行业聚集

文化为核心特色。然而，为满足爆炸式增长的旅游需求，其发生了根本性变异：空间功能发生异化，庭院从居住、生产的复合空间，大量转变为咖啡馆、精品酒店，传统的行业肌理几乎消失。建筑风貌遭受碎片化篡改，如为扩大商业面积而进行的违章加建、使用不当材料与风格的改建，严重破坏了历史的真实性与风貌的连续性。最深刻的风险在于社区主体的置换与社会网络的解体。原居民因租金上涨等因素大量迁离，本地传统店铺被连锁纪念品店、跨国餐饮品牌取代。这意味着，遗产的传承主体、内在的社会结构及其承载的地方性知识、技艺与生活方式被连根拔起。遗产从社区内生、有机演进的生活空间，彻底蜕变为服务于全球游客消费欲望的、同质化的商业舞台，其作为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真实性与完整性）已岌岌可危。

3 跨境协同保护机制构建

面对前文所述由谱系碎片化与跨境互动失衡所引发的系统性风险，传统的以国界为限、以单一遗产点为对象的保护模式已显乏力。为正面回答如何保护的核心问题，本文提出一套具有针对性、系统性的跨境协同保护机制。该机制遵循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理念，设计为由治理框架、技术标准、实施工具3个层面构成的有机整体，旨在通过制度创新、技术整合与社区赋能，修复断裂的谱系关联，抵御商业化与单一化侵蚀，最终实现中国—东盟文化廊道遗产的可持续存续与价值升华。

3.1 创新治理框架

松散的合作论坛或临时性项目难以应对跨境遗产保护的长期性、复杂性挑战。因此，本文提议推动建立“中国—东盟文化廊道遗产共同体”，即具有明确法律人格、权责清晰的常设性国际组织。其核心目标是协调各方行动，平衡保护与发展，并确保遗产保护效益的跨境公平共享。共同体的有效性依赖于一个实体化的三级治理架构与一套精密的运行机制。

三级实体化治理架构包括：1) 决策层，即廊道遗产联合委员会，由各成员国政府指派的部长级代表组成，是最高权力机构。其核心权责在于批准具有约束力的《廊道遗产保护宪章》，共同认定和划定跨境遗产区或主题线路，审批重大保护与利用项目及年度预算。表决机制可采用“协商一致”为基础，对特定程序性事项或紧急拨款辅以“双重多数决”（即成员国多数和代表总人口多数），以兼顾主权平等与决策效率。2) 监督与咨询层，常设专家委员会，由文化遗产、生态保护、旅游管理、国际法等领域的独立专家构成。其职能包括评审项目方案的科学性与合规性，定期监测评估遗产状况并发布风险预警，牵头制定统一的保护、修复、监测技术标准与伦理指南。其专业意见应作为联合委员会决策的关键依据。3) 执行层，常设秘书处，作为日常行政机构，负责协调成员国对口部门，管理“廊

^① 指文化遗产（尤指边境园林）所承载的核心、独特的文化基因（如“防御-贸易”双重属性），因外力影响而发生的系统性流失、功能单一化或符号空洞化的过程。这一概念借鉴了生物学中“遗传侵蚀”指代多样性丧失的内涵。

道遗产基金”，维护信息共享平台，组织能力建设培训，并具体督导获批准项目的实施。

配套核心运行机制是共同体有效运转的保障。首先，设立“廊道遗产基金”，资金来源于成员国按约定比例缴纳的会费、国际组织与私人部门捐赠，以及特许经营收入等。基金采用协同融资模式，优先支持跨境联合项目，并设计透明的利益分配机制，不仅补偿资源输出方，更注重通过项目带动落后地区的社区发展能力建设。其次，设计阶梯式争端解决路径，为合作中的摩擦提供“友好协商”“专家委员会斡旋调解”以及“联合委员会仲裁”的多层内部解决选项，仅在极端情况下诉诸外部仲裁，以维护合作大局。最后，制定并推动各成员国国内立法程序认可《廊道遗产整体管理计划》。该计划是共同体的基石性文件，明确廊道的普遍价值、保护目标、分区分管策略及可持续发展原则，确保跨境保护要求能有效纳入各国地方的土地利用、城乡规划与旅游发展规划中，实现长效治理。

3.2 统一技术标准

数字技术为克服地理分隔、整合碎片化资源提供了革命性工具。为避免各国、各机构数字资源自成体系的“数据孤岛”问题，亟需在共同体框架下，共建基于统一标准的“中国—东盟文化廊道数字博物馆”。这不仅是资源的在线陈列馆，更是支持研究、管理、教育与创意利用的综合性信息基础设施。

数字博物馆建设的关键在于建立覆盖数据全生命周期的统一技术标准体系：1) 数据采集与处理标准。需制定针对园林遗产（包括建筑、植物、山水格局、装饰细节）的高精度三维扫描、摄影测量、多光谱成像的技术规范，明确几何精度、色彩还原度、纹理分辨率等最低指标。可借鉴中国敦煌研究院等机构的成熟工作流程与智能采集平台，开发适应热带环境与复杂构件的标准化作业包，确保原始数据的质量与可比性。2) 数据管理、存储与互操作标准。核心是采用国际文化遗产领域通用的概念参考模型如 CIDOC CRM，作为元数据架构的基础，强制要求资源描述支持中、英及东盟主要语言标引。共建“中国—东盟园林遗产多语言受控词表”，以规范关键词检索。平台需支持 IIIF (International Image Interoperability Framework, 国际图像互操作性框架)、OAI-PMH (Open Archives Initiative Protocol for Metadata Harvesting, 开放文档先导计划元数据收割协议) 等协议，实现图像、三维模型与元数据在不同机构平台间的无缝调用与共享。3) 知识产权与数据安全标准。必须预先厘清数字资源的版权、邻接权归属，探索利用区块链技术进行数字资产确权与使用溯源。建立“开放获取（如基础元数据）—学术授权（研究用途）—商业授权（产品开发）”三级分级授权体系，并制定严格的数据加密、访问控制与隐私保护条款，确保文化安全。

实施路径应采取分阶段渐进策略：第一阶段，由专家委员会主导，完成标准体系制定与核心平台开发；第二阶段，选取 1~2 条跨境遗产线路（如友谊关—谅山段）开展联合数字化试点，在实操中磨合流程、培训队伍；第三阶段，全面推广，并探索基于数字资源的协同研究、线上展览、教育课程开发等可持续运营模式。组织保障上，在共同体下设“数字遗产技术分委员会”，并在中国（如敦煌研究院）或东盟国家设立联合培训中心，确保技术能力的共建共享。

3.3 强化实施工具

再好的制度与平台，最终需落地于具体的保护行动与日常维系。本文设计 2 类关键的实施工具，以强化机制的基层穿透力与风险韧性。

首先是推行“社区守园人”^①跨境认证与赋能计划，旨在正式认可并赋能遗产地本地社区成员的核心守护者角色。该计划包括：制定统一的“社区守园人”认证标准（如居住年限、传统知识掌握程度）；开发跨文化的培训课程模块，内容涵盖遗产价值认知、日常巡查与简单维护技能、文化叙事讲解、游客管理引导等；建立认证、考核与激励机制。经认证的“社区守园人”将成为连接专业管理机构与社区的关键纽带，他们不仅是物理空间的监护者，更是活态文化的持有者与“第一阐释者”。其日常工作能有效抑制遗产的“博物馆化”倾向，维系其文化生态的真实性，并确保保护红利惠及本地社群。

其次是设立“廊道遗产紧急救助基金”。此为针对战争、武装冲突、自然灾害（如洪水、地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不可抗力风险的快速响应机制。该基金独立于常规运营预算，资金来源包括共同体年度预算拨付、国际人道主义组织专项捐助及社会募捐。此外，关键要建立一套简化、高效的应急评估与审批拨付流程，确保在危机发生后最短时间内启动紧急勘测、临时加固、资料抢救等保护行动，为受损遗产筑起最后一道资金安全网。该机制的存在本身，即“命运共同体”精神在文化遗产领域的具体体现。

4 协同机制的应用阐释

研究系统剖析了广西传统园林谱系的特征、风险及其生成机制，并据此构建了包含治理框架、技术标准与实施工具的跨境协同保护机制。为阐明该机制在复杂现实情境中的应用逻辑、适应性调整及其多维效益，选取中国、越南、老挝的 3 个代表性项目进行案例分析。这些案例并非旨在进行“科学验证”，而是作为关键性的实践镜鉴与阐释样本，旨在揭示理论策略如何与地方性知识、跨境合作现实相结合，从而强化“问题诊断—理论构建—策略设计—实践调适”的整体研究链条。

4.1 边境基因修复与活态叙事的在地实践

友谊关作为“南疆第一关”，其核心遗产价值在于“防御”

^① 指在文化遗产地长期生活、熟知地方历史文脉，并被正式认证参与遗产日常监护、文化解说与传承工作的本地社区成员。他们不仅是物理空间的维护者，更是活态文化的持有者、阐释者与传承主体。

与“贸易”基因在历史空间中的活态统一与辩证存在。针对其基因剥蚀与空洞化风险，近年来实施的综合提升工程可视为一次自觉的、本土化的“基因修复”与“叙事缝合”实践，生动阐释了“空间-功能-社区”协同活化的策略路径。

4.1.1 策略核心：从空间割裂到叙事缝合

友谊关综合提升工程摒弃大规模新建，转而以精细化空间干预为核心，旨在修复被现代化设施切割的历史脉络。通过精心设计的“关楼（防御象征）-法式楼（外交贸易）-炮台群（军事记忆）-边贸集市遗存”文化体验环线，将原本孤立的点状遗存串联为连贯的线性叙事序列。此举直接回应了谱系“碎片化”问题，使游客在移动中自然理解“关贸一体”的历史逻辑，实现了从静态展示到动态体验的转化。

4.1.2 活化手段：功能复合与社区再嵌入

为对抗功能的单一化与空洞化，项目在展示“烽火记忆”时，有机融入了戍边后勤、物资流通等隐含的贸易元素；同时，在“友谊关民俗村”等板块，引入中越手工艺、特色美食等业态，复原边境互市场景，使“贸易”基因从历史背景转化为可参与、可感知的当代生活实践。更为关键的是，项目优先雇佣本地居民参与运营与维护，使社区从被动的受影响者，转变为主动的参与者和受益者，为遗产注入了持续的社会生命力。

4.1.3 阐释意义：为跨境联动奠定价值共识

跟踪评估显示^①，修复后景区文化吸引力与游客认知深度显著提升，社区支持度与参与家庭收入实现增长。此案例表明，针对谱系核心风险的“精准诊断”与“在地化修复”，能够有效遏制遗产价值的流失。它不仅为广西边境园林的保护提供了可操作的范本，还重新激活并清晰阐释了“防御-贸易”这一跨境共享的遗产价值，为与越南谅山等同类遗产点构建叙事联动、形成完整的边境文化廊道，奠定了坚实的价值共识与社会基础。

4.2 制度性协同的程序探索与经验积累

位于中越边境的东兴-芒街段是历史上存在密切民间往来的通道。双方对此通道进行的联合生态修复与景观营造项目，虽规模有限，却是一次极具价值的制度性协同“微缩实验”，为前文设想的“遗产共同体”治理框架提供了宝贵的程序性经验。

4.2.1 协同模式：专业驱动联合工作组机制

项目突破了传统的各自为政模式，由中越双方专业机构组成联合工作组，实现了从前期联合勘察、方案协同设计到施工共同监督的全流程深度协作。这种模式确保了生态工法、材料选用、解说系统等技术标准在跨境两侧的统一应用，有效避免了标准不一导致的景观割裂与管理脱节，初步实践了统一技术标准的理念。

4.2.2 核心经验：触及跨境合作的关键程序环节

该项目的深远意义在于其实质地探索并积累了跨境遗

产合作中不可或缺的程序性经验。项目具体触及了联合立项审批、双边协调工作机制建立、跨界工程现场管理、建成后的日常联合维护等一套完整但细微的操作环节。这些经验如同大湄公河次区域环境合作中形成的跨境生物廊道共管机制一样，为未来在更高层级的“遗产共同体”框架下制定更具约束力、可操作的《跨境遗产协作程序指南》或《共同管理协议》提供参考。

4.2.3 阐释意义：验证常设性协调机构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该案例表明，即使在缺乏高层综合性协议的情况下，基于共同利益与专业共识的技术性协同仍可启动并取得实效。其验证了在“遗产共同体”中设立一个常设性技术协调办公室或类似机构的必要性，可持续处理此类日常协作事务。同时，项目过程中难免的协商与磨合，为本文提出的“阶梯式争端解决机制”中的“专家委员会斡旋调解”环节，提供了现实的应用场景与解决范例。

4.3 跨文化技艺网络与活态传承的当代延续

老挝琅勃拉邦世界遗产地内多项佛寺园林的维护与修复，长期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技术支持。其中，引入中国云南西双版纳等地壮族和傣族传统工匠参与的项目，深刻体现了基于历史文化亲缘性的跨文化技艺活态传承，是实施工具层面（特别是“社区守园人”技艺传承模块）跨境应用的典范。

4.3.1 传承机制：构建“做中学”的跨境工匠网络

项目超越了单纯的技术援助或劳务输出，构建了“技艺传授-交流互鉴-本土培育”的开放式传承体系。中国工匠在参与木构修缮、灰塑彩绘等工作时，系统地向老挝本地工匠与青年学徒传授同源的古老技艺，同时主动学习并融入老挝本地的宗教装饰符号与审美风格。这种双向的“做中学”模式，建立了可持续的跨国工匠协作网络。

4.3.2 活态价值：激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

该项目的核心成效在于直接激活了与物质遗产密不可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雕刻、绘画、金箔制作等技艺在真实的修复项目中得到应用、巩固与创新，避免了技艺在博物馆中的静态保存。更重要的是，其为老挝本地培养了一批掌握传统技艺的新生代传承人，确保了相关知识体系能在当代社会环境中延续与演进。

4.3.3 阐释意义：为“社区守园人”制度提供跨国实施路径

该案例成功展示了“社区守园人”制度中技艺传承模块如何实现跨国运作，表明以共同的文化遗产要素为纽带，通过构建“跨境工匠网络”和依托实际项目的实践传承模式，可以有效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协同保护与社区能力建设。这不仅是“技术标准统一”在人文维度的关键补充，更是将遗产保护深化为“人的发展”和“文化对话”的具体体现，为构建更具韧性与包容性的“遗产共同体”奠定了深厚的人文基础。

^① 资料来源于北京巅峰智业旅游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的《凭祥友谊关文化旅游区创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总体规划》以及华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凭祥友谊关片区概念规划及重点区域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内部文本。

5 结论

本研究立足于中国—东盟文化廊道的跨境视野，系统回应了广西传统园林谱系的建构、风险诊断与保护路径三大核心问题。研究发现，广西传统园林在汉地礼制与本土（以壮侗民族为代表）自然智慧的长期交融下，形成了以“功能主导、二元共生”为内核的独特谱系。然而，这一谱系在现代化进程中正面临着“空间—功能—社区”三重断裂的“碎片化”危机。更为关键的是，历史中良性的跨境文化互动（技术、符号、生态层面），在当代资本与旅游的裹挟下已异化为系统性风险的生成场域，集中表现为边境园林核心文化基因的剥蚀，以及过度商业化对遗产真实性的篡改。为应对此复杂挑战，本研究构建了一套包含实体化治理框架（遗产共同体）、标准化数字平台与在地化实施工具（社区守园人）“三位一体”的跨境协同保护机制。来自中国、越南、老挝的实践案例表明，该机制通过价值共释、程序协同与社区赋能，具备现实的可行性，能够有效引导遗产保护从孤立行动走向协同治理，最终实现文化存续、区域发展与社区认同的多维共赢。

本研究的创新性体现在3个方面：在理论视角上，在跨境动态语境中完整建构了广西传统园林的“功能—结构”谱系，提出了“文化基因剥蚀”等解释性概念；在分析框架上，构建了“技术—符号—生态”三维互动分析模型与“治理—技术—工具”三级机制设计模型，提供了整合性研究工具；在实践方案上，设计了一套从顶层设计到社区落地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跨境协同保护系统方案，为区域遗产治理提供系统性参考。

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案例覆盖的广度、机制落地的政治经济复杂性，以及数字标准的具体协议，均有待后续深化。未来研究可在以下方向推进：将本框架扩展至澜湄流域等其他文化廊道进行对比检验；深入追踪与探讨跨境治理中涉及的法律、资金问题，以及争端解决等执行难题；探索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遗产监测与阐释中的深度融合；持续研究“社区守园人”等制度的长效激励与适配机制。

注：图片均由作者自绘。

参考文献：

- [1] 周武忠. 文化通道论：文明对话的理论建构、历史演进与当代实践[J]. 东方设计学报, 2025, 5 (2) : 44-56.
- [2] 陶雄军. 文化廊道视域下的西南建筑文脉研究[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20.
- [3] 何颖, 杨乐燕, 漆亚莉. 打造跨境旅游合作的“一带一路”文旅产业发展新模式[J]. 新西部, 2024 (7) : 96-100.
- [4] 李蓉. 中国—东盟跨境旅游综合治理路径研究[J]. 广西社会科学, 2023 (8) : 59-67.
- [5] 莫秀超. 数字赋能中国—东盟跨境旅游高质量协同发展路径研究[J]. 中国经贸导刊, 2024 (8) : 131-133.
- [6] 毕胭. 广西传统园林文化的传承与应用[J]. 美与时代(上), 2021 (3) : 67-70.
- [7] 郭峦, 方婷. 中越德天(板约)瀑布跨境旅游合作区建设：经验、

问题与对策[J]. 广西经济, 2024, 42 (4) : 60-69.

[8] 王明明, 谢春红. 文化遗产保护科研领域开放合作机制研究[J]. 科技管理研究, 2020, 30 (19) : 15-18.

[9] 胡最, 刘沛林, 谭敏. 文化景观基因组图谱：传统聚落景观的科学语言[J]. 地理科学, 2024, 44 (8) : 1309-1321.

[10] 黄爱莲. 要素流动重塑跨境旅游合作空间的内在机理与演化路径：以中越边境地区为例[M]. 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 2025.

[11] REDFIELD R, LINTON R, HERSKOVITS M J. Memorandum for the study of acculturation[J].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36, 38 (1) : 149-152.

[12] BRUNS D, KÜHNE O, SCHÖNWALD A, et al. Landscape culture-Culturing landscapes: the differentiated construction of landscapes[M]. Wiesbaden: Springer VS, 2015.

[13] BARTHES R. Mythologies[M]. LAVERS A, tran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72.

[14] ECO U. A theory of semiotic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6.

[15] BAKHTIN M M.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M]. HOLQUIST M, ed. EMERSON C, HOLQUIST M, tran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1.

[16] BERKES F. Sacred ecology[M]. 3rd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17] 戴代新, 万棒, 王敏. 中国古典园林的生态智慧及对当代生态修复的启示[J]. 城市建筑, 2023, 20 (19) : 217-220.

[18] 王劲. 顺化“遗失”的水系与皇家园林遗迹[J]. 中国园林, 2019, 35 (12) : 129-134.

作者简介：

李军/1981年生/男/湖南祁阳人/硕士/广西民族师范学院艺术学院(崇左 532200)/正高级工程师/专业方向为风景园林

桂杰/1982年生/男/湖南祁阳人/本科/华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南宁 530000)/高级工程师/专业方向为给水排水工程